

《汉书》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导师：白寿彝 撰者：许殿才

《汉书》是一部取得卓越成就，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古代史学名著。本文试图把《汉书》放到其问世的时代背景和史学发展的总序列中加以研究，以便重新认识与评价它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一、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公羊学派大力阐发大一统之义后，它更成为封建政治的首要问题。割据政权把一统作为最高追求目标，统一皇朝把一统规模当作政治成就的主要标志。中国的大一统事业由秦开创，由汉巩固发展，它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班固生活的东汉初期，刚刚结束的西汉一统皇朝作为一个完整朝代所建树的宏大规模和不朽功业，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因而及时记录这一伟大历史变局，反映西汉的历史成就，成为当时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西汉史的记述，汉初即已开始。陆贾的《新语》及时总结了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但它只能反映西汉历史的一个侧面。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西汉前期的历史，但历史发展的不完整限制了他的记述，况且把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实际上也未能突出西汉历史的重要地位。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对他撰写《汉书》的旨意作了明确说明。他认为象唐虞三代这些儒家理想的社会，也得靠世有典籍才能够扬名于后世，对于建立起更为恢宏的帝业，取得更大成就的汉朝，当然也要有相应的著作为之鼓吹，才能使其成就得到播扬，在历史上确立它的地位。正是基于对西汉皇朝一统功业的清楚认识，为了纠正司马迁对西汉历史的摆法，班固才采取断汉为书的措施，撰写成了断代史巨著——《汉书》。对于班固首创新断代史的功绩，人们评论较多，但只有了解到他是在自觉地用适当的史学形式去反映社会格局的变化，是在用前所未有的历史著作来记述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皇朝，这才算真正理解了他断代为书的根本意义。

为了更好地完成著述宗旨，如实反映西汉的规模气象，班固在著述体例上下很大功夫，他采用司马迁创造的纪传史体而把它改造为断代体制，为其撰述找到了适宜的方式。书中班固成功地记述了西汉一统社会的规模与成就，如实展现出西汉时期皇权专制制度健全、完善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规模扩大的历史过程。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西汉大一统皇朝刚刚结束之时，班固通过别识鸿裁使封建大一统这一新生事物的巩固、发展过程得到及时记录和如实展现。这是《汉书》的主要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汉书》是在通识指导下写成的断代史。书中尽量贯彻着通古今的意图。有通有断、寓通于断是《汉书》断代的特点。后来史家见不及此，用刻板的断代观念来评论《汉书》，不但对它产生种种误解，也把史学导入枯燥空疏、毫无生机的死胡同。

二、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

方面作出重大突破。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出《汉书》的博洽，又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了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有首要地位。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中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着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的礼乐制度演化情况。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后起诸史的书志中一般都有这部分内容，但能写出《汉书·礼乐志》这样水平的却很少见。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是书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志中介绍了由古至汉兵刑制度演化梗概，重点叙述的是汉代法制情况。班固在志中探讨了刑狱失平之由，结合东汉初期的社会现状，提出很有价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体建议，体现出他政治主张的切实，也表现了他把历史引入现实的撰史倾向。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才能收到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预期效果。《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也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在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地理志》也是班固的一个创建。志中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志中有关国家职能的记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

细记载，反映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二是通过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依据。《汉书·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县诸志的典范，也对后世地志诸作有着很大影响。清代以来，《地理志》成为历史地理学者的热门研究对象，由此推动了西北地理之学的发展。

《百官公卿表》这一体制为《汉书》首创。它用简明方式记录了西汉三公九卿的迁免死。它的序长达五千余字，名曰表序，实为志体，其中除阐述秦汉的官制概貌及沿革，反映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外，还论述了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其设置得失。它为封建政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章程。

《汉书》对社会经济的记述，主要是通过《食货志》和《货殖传》等篇章展开的。

《食货志》是书中的优秀篇章，主要记述从古代到王莽时期的经济情况及历史演变。它以耕织为中心线索把食、货分为上、下两篇，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本质特点。《食货志》较《史记·平准书》有很大进步：首先，它的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经混杂的撰述方式。其次，它的记述范围有很大扩展，《平准书》以汉代为限，《食货志》却贯通古今。第三，它的材料搜集也更齐全，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它都详细作了记载。其四，《平准书》主要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讽刺、批判，没有提出很多的建设性意见。《食货志》则系统阐述了班固的经济观点，《汉书》的富于建设性，可以在《食货志》中得到充分证实。

《汉书·货殖传》是对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案介绍。它对《史记·货殖列传》在史实上没作太大补充，在思想观点上则表现出很大歧异。司马迁对富、利的认识与理解，较多摆脱了儒家

思想的束缚。班固对经贸活动的看法，则同整个社会的经济、礼仪、教化、治安等现实环节联系更为紧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价值，适当肯定司马迁经济观的思想价值是很正确的，但过分贬抑班固就有点不公平了。

《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也有很大进展。它通过《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较完整地记录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补了相当多的史实。《汉书》的民族史记述，展现出国内外各族人民生产劳动及民族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历史，也反映了在汉一统政权之下，国内各民族交好、征战，并逐渐融合的历史。在对内意义上，它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胸襟；在对外意义上，它放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民族思想的发展。在史学上，它对史书中记载民族历史优良传统的形成有所推动，后世史家对此踵续不绝，才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得到较完整记录，这对世界文明史研究也是一个贡献。

《汉书》对学术文化史的撰述主要体现在《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儒林传》及各学者的合传或专传中。

《五行志》为《汉书》首创，记载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学说，可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教材，因此历来受人攻击较多。但我们客观地分析就会得到下列认识：1.这种学说在当时客观存在，而且流行很盛，史家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2.在封建迷信的外衣下，本志记载了许多有关自然现象及其变异情况，对此的记述和解释，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可贵精神，而且这些记载为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3.志中的灾异说，在封建社会里对最高统治者具有儆戒作用，对其行为是个约束，志中修人事以胜妖孽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本志在大小序中详述古

代各家学派的学术特点及其得失，作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工作，可抵一部学术简史。《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目录学重要流派，推进了古代文献学的发展。《艺文志》 also 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在东汉初图讖盛行之时，它却不收录讖讳之书，反映出人文主义倾向。在术数类各小序中，班固还表述了他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学说的怀疑及否定态度。

《汉书·儒林传》是儒学思想发展变化的专史，它与《艺文志》有机结合，再配以各学者传，完整地反映出古代特别是西汉的思想及学术情况。

《汉书》在学术史的撰述中，对儒家学说的变质作了准确揭露：一是儒家学说渐杂机祥，逐步偏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宗旨，而与宗教神学相结合，成为天人感应的新学说。二是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经生谋生手段，变为禄利之路。这个揭露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三、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

班固继承古代史家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如实记录了封建统治者淫逸腐败、残害人民的罪行。东、西汉统治者有着亲缘关系，班固能无所顾忌，奋笔直书，显示出高尚的史家品德。

班固对史学功能有着自觉的认识，对于以史为鉴的思想，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书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以对历史的准确记述作为基础的，实录精神与鉴戒思想的结合，形成《汉书》的鲜明特色。

《汉书》揭示出昭宣中兴时期以至宣帝统治前后期社会、民情及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书中也交待出在变

化中有不变的东西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经验。这又为封建统治者指明了治国的根本大计。这个记述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显示出班固历史考察的深度，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鉴戒功能。

《汉书》还善于见盛观衰，能从兴旺繁荣的表象下，挖掘出潜藏的社会问题，并探明产生问题的历史原因。对文、景时期社会问题的揭露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当然，任何一部史著的真实都是有限度的。《汉书》的实录精神离不开为地主皇朝服务的根本目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决定了他对封建政权、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看法上的错误。但我们也不应苛求古人，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古人。

对《汉书》的正宗思想问题，我们也应持同样态度。书中确实表现出很强的正宗思想，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但由此过分诋毁班固、贬抑《汉书》则属过当之举。按现在的标准衡量，封建正宗思想当然不好，但在历史上，它却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班固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对于班固的宣汉，人们颇多非议，殊不知这正是当时历史的需要。

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表明他同司马迁思想的一些差异，是他正宗思想较浓的表现，其中确有一些消极因素。但我们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就不难理解其时代的局限。

四、历史变化与天人关系

（一）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对历史变化问题，班固有着明确认识，这在具体撰述中表现有三：一是通过史实的撰述反映历史的客观变化；二是注意把历

史问题放到历史发展变化的总序列中加以考察论述；三是注意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本身变化情况的考察。

从历史变化思想出发，班固还提出顺时应变的思想，这个思想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人们行为及政策措施，以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其二，历史的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人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前代遗产的取舍。这种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改革家、思想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书中也论述到历史发展问题，对西汉历史成就的由衷赞美及高度评价，明确表现出班固后代胜于前代的进步思想。对于复古倒退思想及行为的批判性记述，更用有力的事实论证了泥古不化必遭失败的道理。

（二）《汉书》中的天人关系

《汉书》中的“天”有几种含义：一是指冥冥中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是一种至上的人格神，这是“天人之际”中，对天所赋予的基本定义。二是指客观运行的自然界。这种客观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书中所记的很多天象及物候变化都是这种自然界的正常运动。三是指一种客观趋势，即所谓的“势”或“时”。这其实已接触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是在天的招牌下，推行着唯物主义思想。书中对王莽篡汉及刘邦帝业之兴的分析，都把这种时、势的作用放在重要地位。班固对于时势的认识中还包含着时势造英雄的意味。这些都是历史思想进步的体现。

《汉书》中所讲的“人”也有不同含义。首先它是指在历史发展变化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人事与人谋。班固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人是有所作为的，书中重人事思想颇为突出。对文帝即位和昌邑王废立的对比描写充分显示出人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书中还有杰出人才推动历史前进的可贵认识，这与上文所言时势造英雄的观点是相反相成的。

《汉书》中的人，也泛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班固思想中人居于重要地位，历史活动的目的和是非评价的标准都应当以人作为出发点。这与人道主义有些接近，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这一思想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班固的重民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一是以民为本，把民作为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书中把“合民心”作为评价历史行为或政策措施的价值标准，显示出班固历史眼光的深邃。其二是民心关乎国家盛衰，这又把重民看成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显示了《汉书》中蕴藏的历史智慧。

《汉书》对天人关系的看法打着时代的印记，它认为超自然的天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超自然的天在一定条件下与人有着相互影响。

班固所言天对人的影响主要是君权神授和谴告说，这是书中的消极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论人的行为对天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班固用正反例子论证了在天人关系中，天只是起着被动反映人事的作用，对于人事的改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阐发的修德以胜天道的思想，虽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却已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到重要地位，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汉书》对天人关系所作回答中，最有价值的是它对求仙祭祀和讖纬符命的批判。班固继承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郊祀志》中对秦始皇、汉武帝的求仙祭祀活动集中作了批判。他对讖纬符命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东汉初讖纬符命活动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班固以王莽为靶子，借助历史武器对它的骗人真相进行揭发批判，起到了儆醒人心，教育民众的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反神学思潮的一部分。

“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及政治论题。董仲舒力

倡“天人感应”之说，在汉代及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很大消极影响。班固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尽量压低天而抬高人，肯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表现出他史观中的进步因素。

五、严整的史书体例

史书编纂中，如何用适当的形式表述历史内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史书以体裁丰富、义例精当见长，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史记》和《汉书》对此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史记》创立纪传史体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但《史记》毕竟是开创之作，难免存在粗疏之处。《汉书》继《史记》而起，她对于《史记》体例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进一步明确了纪、表、志、传的各自功能，确立了整齐划一的纪传体新规模，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这一体制成为中国史学主导流派。

他还吸收《史记》在列传编排上追求内在联系的优点，书中各传编排体现了他独到的历史见解。他的叙事也匠心独运，富于变化。他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一是运用互见之法贯穿史事；二是传中附传，联带记述；三是以文代传，借文传人。

另外，从文学的角度看，《汉书》的语言古拙典雅，遣词造句皆经过千锤百炼，叙述史事跌宕有致，要言不烦，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多有可称道之处。而其中多收文章，又成为《汉书》不同于其他史书的一大特色。

总之，无论从对史书体例的突破与创新，还是从其书本身的史学、思想与文学艺术的价值论，《汉书》都不失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即便与《史记》相比，也是各有千秋。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